

参加第8届IFAC世界大会回忆

秦化淑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980年4月，中国自动化学会在北京举行换届大会。宋健同志当选为第三届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关肇直先生为副理事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关先生被聘为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疏松桂先生为副主任，自动控制界的多位专家学者如张钟俊、张嗣瀛、黄琳、冯纯伯、许德继、何善培、涂序彦等均入选为专业委员会委员，我为秘书。专业委员会挂靠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

IFAC是“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的简称。第8届IFAC世界大会定于1981年7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从第1届到第7届IFAC世界大会，中国自动控制界人士投给大会的文章都要先在中国自动化学会初审通过后再投大会，因此这次投给第8届IFAC世界大会的文章也沿袭了以往的作法，中国自动化学会要求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此次初审。我与黄琳、冯纯伯、张志方、何善培、涂序彦、郑应平、王恩平等参加此次初审活动，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自动控制界第一次组织为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投稿的初审活动。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外学人来我国访问的人数渐多，他们对中国学人取得的成果不乏赞美之词，科技界领导出于不同认识和目的对这些赞美表现出欣赏和支持。同时，国内学人对国外科学技术进展

既好奇又钦佩。这时，自动控制界有个别学人企图走捷径，或者直接抄袭国外成果或改换名词术语把他人已有成果作为自己的创造。在这样的形势下，上面提及的初审活动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出现过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经过关肇直先生、疏松桂先生、屠善澄先生、自动化学会副秘书长王鸿滨以及包括黄琳、冯纯伯、郑应平、王恩平等在内的专业委员们的协调，初审通过了十多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经第8届IFAC世界大会评审后录用。同时，也有一些个人自由投稿的文章被大会录用。

中国自动化学会是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英文缩写为IFAC）的发起国家成员之一，该联盟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组织每三年一次的IFAC世界大会，自1960年的第1届IFAC世界大会至1978年的第7届IFAC世界大会皆由中国自动化学会组团参加（因“文化大革命”中国自动化学会未能组团参加第3、4、5、6届IFAC世界大会）。中国有两个代表团参加第8届IFAC世界大会，一个是由宋健理事长任团长的中国自动化学会代表团，团员有屠善澄（他多次代表钱学森先生出国参加IFAC的活动）、张嗣瀛、王良楣、冯纯伯、周春晖、顾绳谷、吴沧浦、陈翰馥、蔡福元、项国波、韩京清、秦化淑和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陈汉明等；一个是由郑维敏教授任团长的中国教委系统



代表团，团员有吴麒、李训经、袁著祉、邓聚龙等。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关于如何做好学术报告、如何恰当地回答问题、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如何提问题等等都无经验，虽然事先都尽量做好准备，争取尽可能临场发挥得好些，但许多人心里总是有点忐忑不安，还需要有中英文皆好的同事和朋友在场“壮胆”。以我为例，就请了吴麒老师和谈自忠教授到场。结果还好，外国学人提的问题我都听懂了，回答问题也还恰当。不过，我仍然十分感谢他们，至今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说起来虽觉幼稚可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人对外交往方面的不成熟。

中国虽然有两个代表团参加大会，但大会期间的不少活动两个代表团的很多成员都是一起参加的，如参观丰田公司设在名古屋的总部、参观

早稻田大学、游览岚山公园等。参观早稻田大学时，教务长示村悦二郎（分布参数系统控制工程专家，曾于1980年来中国时访问过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接待我们。他简要地介绍了该校的情况及其工学院电机系控制工程教师教学和参与工程设计项目的案例，给我的感觉是该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工程为主，理论研究少而不突出。参观名古屋丰田汽车公司的装备车间、新产品研发及展示部门时，接待人员扼要地介绍了“丰田”的发展史、规模及新产品开发等等。当时有两点使我感受颇深：一是装配过程基本实现自动化，现场工人很少，

绝大部分工序由机械臂操作完成，速度快、安装又精确；二是研发工作既超前又不脱离一线生产。这次参观不仅使我大开眼界，同时也深感我国的自动化事业有广阔的前景。

参加大会的十多天时间里，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旅馆的保洁工作做得很好，保洁员们（女）不仅房间内看得见的地方清扫得十分干净，即使是看不到的地方如门缝、厕所水箱、墙角缝处都每天擦洗，甚至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墙角等等；二是日本城市交通十分拥挤，绝大多数上下班的人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乘新干线车、公共汽车等，个人开车上下班的极少。起初我很纳闷，日本这样一个汽车生产大国，其国民上下班都不自己开车，是不是买不起车？为此，我曾问过几个日本的教授朋友，他们回答我说：“日本国土小，人口密集，交通拥挤，如果多数人都开车上下班，那交通的拥挤程度不堪设

想。而且，日本的公交系统比较完善，人们上下班十分方便。日本绝大多数家庭都有车，通常他们都在节假日开车出游。”时隔三十多年，就现在来看，我国在这两方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参加大会回国后，中国自动化学会代表团花了大半天时间进行总结，在总结会上，许多代表团成员谈了参加此次大会的感受，普遍认为“收获不小，既开阔了眼界，又看到了差距”，特别是感觉到自动化事业有广阔的前景，只要全国同仁们加紧努力，奋起直追，现存的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小的。同时，总结会上也出现了争论。这件事的缘由为：前苏联学者、分布参数系统控制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他主持的分组报告会上，对我国代表团一位成员的报告说了赞赏的话，这位当事人坚持必须把赞赏的话写入总结报告中，而绝大多数成员则认为不必写入，赞赏的话并不是正式或书面的评价，只是出于客气和礼貌。但当事人仍然坚持，就这样，会上沉默了一两分钟。最后，代表团长宋健发话：“某某！你不要太过分了。”这时当事人不再讲话了，最后总结报告中也没有写进赞赏之类的话。从这次争论看出，改革开放初期，和其它某些学界一样自动控制界内也还是有人缺乏自信的。

此后的30多年，我国在自动控制领域的进步是惊人的，在近年的几届IFAC世界大会上，中国的与会人数及宣读论文数均名列前茅，而且我国学者还不止一次在IFAC世界大会上作大会报告。我们还在1999年在北京举办了第14届IFAC世界大会，它是我国自动化界前辈们多年来为之努力的追求。抚今追昔，我感慨万分，仍为当年的拘谨和幼稚而心存遗憾，然而更多的是对今日我国自动化界的繁荣而欣慰，对其创新发展充满信心。